

張大可文集

第十卷

中國文獻學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張大可文集

第十卷

中國文獻學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献学/张大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张大可文集)

ISBN 978-7-100-09389-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史籍-文献学-中国
IV. ①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5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文献学

张大可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09389-7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640×980 1/16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定价:12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中国文献学》，编列文集为第十卷。该书既是作者编著的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作者建构综合性通论文献学理论的尝试。作者认为，《中国文献学》不是传统文献工作产生的分支文献学，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的叠加，而是20世纪产生的一门综合型的文献学新兴学科，它的理论建构还在探索之中。该书重新定义文献，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均为文献。”文献学应以一切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也就是包括古今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新理论。全书十二章，前十章以20世纪传世的古文献和新增的历史文献为对象，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四个方面的内容，别具一格。第十一章为本次入集时所增，从作者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移来。本章补充论述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历史与成就，回照全书。《中国历史文献学》是本书《中国文献学》的前身。读者对照两书的目录，可以领略作者建构中国文献学理论探索的足迹。第十二章继续探讨文献学理论的架构。书后两个附编。附编一，典籍评介四篇，为相关的文献研究。附编二，收录作者主编三部高校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的前言，从一个侧面记录作者致力于教材建设的艰辛历程。

自序^①

中国文献学既年轻而又古老。说它年轻，是因为“文献学”这一概念是20世纪产生的新名词。“文献学”的建构是20世纪80年代后正式兴起的学问，它的理论建构还在探索之中，并未形成定式。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国文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它是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产物。中国文献学的产生，从孔子整理六经算起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传统文献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许多分支文献学科。但是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而只有“文献”的定义，于是有学者认为：古代只有文献工作，没有文献学。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有文献工作，就有文献学。所谓“学”，就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实践工作的理论积淀。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凭空产生。某一门学问的实践工作，它既是基础，也是这一门学问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献工作本身就是文献学的构成部分。

于是又有了另一个极端，把整理文献的基础工作所产生的目录、版本、校勘等分支学科叠加起来叫做“文献学”，这也是不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目录、版本、校勘，既然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有各自独立

^① 本文是初版自序，保留以见写作历程。

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那末叠加起来的“文献学”，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在哪里？被叠加的几大块与叠加起来的总体，岂不是完全重合的码？显然叠加起来的“文献学”是一个空头的学科，因此是不能成立的。换句话说，“文献学”不是目录、版本、校勘的叠加，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文献学”既然是20世纪新生的名词，它应当是20世纪新生的学科，所以是年轻的。由于“文献学”是以古今的一切文献，以及古今一切文献分支学科为研究对象，它不能脱离目录、版本、校勘等而独立存在，所以又是古老的。

如何解读这种关系呢？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传统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省称古文献学，它由许多分支文献学组成，一是由校雠工作而发展演化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再是由经学讲习传授而演化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等。文献的数量与日俱增，文献工作不断发展，因此，古文献学的各分支文献学是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20世纪文献大发展，文献工作随之发展，因而产生了新的文献学分支学科，大体说有三个系统。一是伴随新型出版社和图书馆的产生这一新生事物，产生了编辑学、图书馆学、图书馆目录学、索引书目学、文献检索学、文献情报学等；二是科技与文化发展，产生文献新载体，从而产生了载体学、电子文献学、古籍整理学、今注今译学；三是新材料发现，产生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甲骨学、简牍学、古文书学、档案学等。20世纪新增的这些文献学分支学科，可总称为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总称就是“中国文献学”。但这只是广义上的“中国文献学”，仅仅是一个称谓，不具有理论建构，不是一门学科。

学术的发展是不断地深入和分支，同时也要求有不断的综合。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众多的分支文献学，而如何总结这些分支文献学的经验，把握各分支文献学的发展规律，上升为指导性的理论学科，这就是综合型的通论文献学，即狭义文献学。狭义文献学以广义文献学的各分支文献学为考察对象、研究范围，进行综合的理论归纳，有对象、有范围、有目的，所以是

一门新生的学科。在这里，广义文献学与狭义文献学二者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对象，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归纳。因此，狭义文献学考察叙述的内容，仍然是目录、版本、校勘等，但它不是这些分支文献学的叠加，而是升华、总结这些分支文献学的经验，纳入一个宏观的体系之中，成为文献学的高超层次。各分支文献学是基础学科，也是实证学科，分支文献学是微观狭小范围的理论总结，文献学是宏观综合范围的理论总结，是高级形式通论文献学理论。

在中国旧学者的思考中，把文献学泛称为校雠学和考据学，始终摆脱不了产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当时的学术环境与基础。由于这一思维定式的惯性波及，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产生的几十部“文献学”论著，十之八九仍徘徊在古典文献学的樊篱之中。他们考察文献的范围到“五四”为止，以古籍为界域，看不到新生文献的发展，漠视新文献工作的主流形态，至今还没有一部现代文献学的产生，这个偏差应予纠正。

文献学是总结文献工作之学。文献在发展，文献工作在发展，文献学也理应向前发展。让我们看一看 20 世纪文献工作的特点。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步入电子时代快速发展的新世纪，科技文化的高涨，使全社会人民大众文化整体素质提高。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中国的“五四”运动，结束了文言文写作的传统积习，社会进步，教育发达，白话文写作，这一切带来了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各种写作人群以百万计。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精神食粮已成为社会全体人群每日必需的消费产品，再加上现代印刷具有无限的生产能力，20 世纪文献的生产以几何级数成百倍地增长。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出版的图书发行量就达五六亿册，还有报刊、杂志、媒体文献，数不胜数。事物的发展，总是量变引发质变。20 世纪的文献工作，就是由于当代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改变了文献工作的主流形态，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文献工作是学术型的整理旧籍，宗旨是修复还原

所整理的文献原貌，20世纪产生了服务型的文献工作，即图书馆业务，宗旨是大规模收藏图书，向社会开放，于是产生了图书馆目录与图书馆检索的文献工作，并产生了新的文献分支学科，即图书馆学与文献检索学。正是由于图书馆目录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革新了目录学。

第二，传统文献工作，以专业文献学者为主体进行综合整理，版本、校勘、考据、辨伪、结集、收藏等一系列文献工作，一条鞭完成，毕其功于一役。古代国家大规模整理图书，尤其如此，如西汉刘向校书，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就是适例。私人刻书与收藏整理也大体如此。20世纪文献工作以个人为主体的综合性整理日益淡出，而社会分工与群体协作的专项文献工作成为主流形态。这就是当代古籍整理，它由学术团体、社会学者、出版社与图书馆，诸多部门协作完成，并且成为经常性的程式工作。

第三，文献工作是还原旧籍，学术研究是解读历史文献内涵，两者有很大区别。20世纪产生了文献工作与学术研究两者交融而不可分割的新学问，那就是20世纪新材料带来的新学问，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吐鲁番古文书学，以及考古学。这些领域的文献工作与学术研究是兼容的，也是20世纪前传统文献工作所没有的。

第四，20世纪科技日新月异，于是产生了不断拓展载体转换的文献工作。从技术角度说，当代古籍整理就是印刷载体的转换，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就是电脑与网络为载体的转换，这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20世纪文献工作的上述特点，已生动地表明，乾嘉时代的旧学高峰已成历史，新学的潮流浩浩荡荡，文献学建构怎能固步自封囿于“五四”以前的旧籍呢？

不可置疑，经历2400多年积淀的古典文献学各个分支学科所创立的理论和经验，是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例如目录、版本、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只要有文献整理，这些基础工作都是不能改易的。整理“五四”以前的旧籍，四部分类的目录也是最完善的。但是一部综合型的文献学理论，它应贯通古今，

包括新学与旧学，以古今一切文献为对象，所以这是一门新学问，而不是旧学分支的叠加，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专门之学，其基础是微观研究，而综合型的文献学是宏观概括，它以总结各分支文献学微观研究的成就、经验、方法，升华为综合型的宏观理论，对考察文献工作的走向提供指导。

20世纪是旧学与新学的一个过渡时期。20世纪上半叶，旧学还占主导，新学延生；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新学占了主导。构建综合型的文献学理论，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成型的。因此“中国文献学研究一百年”，可以有两个思路：一是只总结“20世纪的古典文献学”，只讲旧学，不讲新学；二是总结“20世纪的文献学”，或称“现代文献学”，包括旧学与新学。本书采取第二个思路，因此，对文献学的定义，采用“以一切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新理论，用以反映20世纪整个时段的文献内容与文献整理工作，而不囿于古文献的范围。具体说，“中国文献学研究一百年”的内容和任务，就是要概括整个20世纪这一时间段的整体文献学，它以20世纪传世的古文献和新增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进行现代综合性通论文献学理论建构的尝试。^①目前学术界出版的诸多文献学论著，基本上仍停留在传统古文献学几大块的研究范围内，所综合的理论仅是对传统文献学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如果目光只囿于传统的古文献学，那么文献学的旧框架就无法打破，这不仅远离实际，而且全新体系的文献学理论将永远无法建立，这是有悖于学科发展的。由于20世纪文献与文献整理工作的迅猛发展，反映这一时代的文献发展与文献整理工作，建立全新体系的文献学，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的肩上。为此，本书作者不揣简陋，借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的机会，大胆地进行文献学理论的建构，以期抛砖引玉，收效于将来。

^① 笔者1988年组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编写就是按这一思路建构的。因此该书为编、章结构，详本书后附编二该书前言。

最后，我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气魄，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制定和组织“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抓住了20世纪时代变革的特点，总结这100年的学术成果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巨大影响。我还要感谢协助出版社主持这一计划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是他的信任交给了我这一任务。时间是2002年秋，希望我在2003年完成。由于我手头正在统稿“史记研究集成丛书”的工作，力争在2004年出版。这套丛书十四卷有八百万字的规模，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统校，本身压力就很大。因此2003年我无法转移工作重心，于是承诺在2004年3月底交稿。浙江师大中年教授俞樟华与我长期合作，共同主持“史记研究集成工作”，于是我请樟华同志与我共同承担，又正值樟华同志因眼疾需要休息，暂时不能展开工作。但在困难条件下，樟华同志仍然搜集了百余万字的资料，提供20多本参考书，其精神感人。我凭借这些资料和参考书断断续续生产零件，一个一个的问题在间隙中完成。本书出版，我与樟华同志合署发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编部陈远唤主任协助第十章电子文献一节的写作，弥补了我的不足。2003年底，“史记研究集成”工作告一段落，完成统稿付排版，于是回过头来组装这部文献学书稿，总算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初稿，这时又要投入“集成”的校对工作。这部“文献学”的校对、修改又陷入了间隙工作，当二校完成，杀青已定，已是2004年五月十五日了，离预定交稿时间拖了一个多月。在整个工作进程中，傅璇琮先生始终予以坚定的信任与支持，不断督促，才得以完成。如果没有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傅璇琮先生的坚定支持和信任，这部书稿是不会产生的。为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对文献学研究不够，水平有限，加之时间匆忙，自己很不满意，本书的理论建构也只是一种探索，说不上是“一家之言”。如前文所述，权作抛砖引玉吧。

张大可

2004年5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文献与历史文献新界说	1
第二节 传统的文献整理与古文献学	7
第三节 20 世纪的文献学	14
第二章 文献载体	21
第一节 印刷术通行前的古文献及其载体	22
第二节 雕版印刷文献	37
第三节 活字印刷——20 世纪的主流载体文献	52
第四节 现代技术载体文献	60
第三章 20 世纪新发现的古文献及古今档案与考古文献	65
第一节 甲骨文献	65
第二节 简牍文献	75
第三节 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	90
第四节 档案文献	98
第五节 考古文献	109
第四章 典籍类别文献	116
第一节 四部典籍文献	117
第二节 类书、丛书	130
第三节 方志文献	134
第四节 佛藏、道藏	137
第五节 20 世纪的当代文献	142
第六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	157

第五章 目录学	165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65
第二节 中国古典书目分类法的演变	167
第三节 20 世纪目录工作的扩展	172
第四节 图书分类法的变革	174
第五节 目录学的功能	182
第六节 20 世纪的目录学家及其成就	185
第六章 版本学、校勘学	193
第一节 版本学	193
第二节 校勘学	206
第七章 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	218
第一节 考据学	218
第二节 辨伪学	228
第三节 辑佚学	239
第八章 20 世纪的古籍整理	248
第一节 古籍整理的方法	248
第二节 结集整理	257
第三节 资料汇编	260
第四节 古籍整理的发展与成绩	265
第九章 古籍的今注今译	272
第一节 古代的注疏	272
第二节 古籍的今注	277
第三节 古籍的今译	283
第十章 文献的收藏与检索	300
第一节 现代的图书馆藏书	301
第二节 检索工具——索引书目	307
第三节 文献的检索原理和方法	310
第四节 音像文献的检索	318
第五节 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	319

第十一章 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	327
第一节 中国文献学的产生——先秦时期	327
第二节 中国文献学的形成——两汉时期	338
第三节 中国文献学的发展——魏晋至宋元	349
第四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高峰——明清时期	361
第五节 近现代的文献工作与文献学——“五四” 以来的新时期	375
第十二章 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建构	389
第一节 综合型通论文献学是文献学体系中的新兴学科 ..	389
第二节 郑鹤声建构文献学理论的尝试	390
第三节 张舜徽建构文献学理论的奠基性贡献	394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文献学论著的兴起	398
第五节 文献学理论研究	402
附录：《中国文献学》征引及参考主要书目	405
附编一：典籍评介四篇	409
纪传体全史概述	411
《晋书》评介	425
《水经注》评介	442
《资治通鉴》导读	446
附编二：教材建设	463
《中国历史文选》四题	465
第一题 谈谈《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改革	465
第二题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研讨	473
第三题 商务版《中国历史文选》前言	478
第四题 求真求实，打造精品	485
《中国历史文献学》前言	489
商务版《史记教程》前言	493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 20 世纪文献学内涵的架构模式做概略的探讨，为全书之纲。

1

第一节 文献与历史文献新界说

文献，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和经验，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文献”一词的含义在不断的变化与扩大。由于“文献”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是“文献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献学”的内容也是伴随“文献”词义的扩大而发展。“文献”词义的变化是怎样随历史的变迁而发展，当今对“文献”的词义应赋予什么样的新的理念，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

一、文献的本义

“文献”二字连用，最早出自孔子的言论，记载于《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

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大儒郑玄、朱熹等以典籍释文，以贤人释献。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明确地解释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人刘师培在《文献解》中进一步申说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又说：“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上述诸儒解释“文献”词源本义甚确。“文”，指典籍文章；“献”，指耆旧先贤所熟悉的各种礼仪，以及耆旧先贤的见闻、言议与事迹。由于在上古时代，文字记录以甲骨、金石、简牍等物质材料为载体，书写十分困难，因此历史及知识的传授，大量是通过口耳相传，少量的才是文字记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指出，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是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不同的传授记录。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说明在左氏成书之前，《春秋》的传授是口耳相传。公羊、谷梁两家，更晚于战国时成书，口耳相传的时间更长。孔子的《论语》也是由门人弟子“相与辑而论纂”成书的。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也是和当时的物质条件分不开的。口耳相传历史与有知识的耆旧贤士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为“圣”、“善”、“哲”、“贤”，他们是知识的载体，统称为“献”。

孔子慨叹夏、殷之礼久远，而夏、殷的后代杞、宋两国保存的文字典籍不多，口耳传授知识的贤士大夫寡少，无法考证。要是杞、宋两国文与献两方面的材料充足，夏、殷之礼就能够验证了。这表明孔子鲜明地认识到叙述历史，考核史事，需要充足的文献做根据，他晚年致力于六经的整理，就是要为历史保存文献。而正是由于孔子整理六经的文献工作，萌芽和产生了文献学。

二、文献含义的演变

宋末元初，马端临以“文献”二字名其书，曰《文献通考》，

并在该书“总序”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马端临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的《文献通考》，不是通考“文献”的文献学，而是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他之所以认真地辨析“文”与“献”，旨在说明《文献通考》的取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图书资料，二是名流言议，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记载；凡是低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言议。正因为“文”与“献”两字有不同的含义，而又为孔子所连用取证，使得古代学者把书本记载与传说口碑、名人言议并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过细细推敲，马氏笔下的“文献”二字，含义已有了变化。孔子所说的“献”，指贤者身之所习与口传的知识，而马氏换题为“论事”，凡臣僚奏疏、诸儒评论、稗官记录都包括其中，这些已经是“文”的范围。马氏论事中的“名流燕谈”还保留了“献”的本始意义。这一部分，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例如采访的调查报告，记录硕学以及各行艺术大师的口述资料，还有民间一些风俗礼仪的演习与整理，都需要请教那些熟悉方方面面掌故的人。

马端临对“文献”一词所下“叙事”与“论事”的定义，实际缩小了原始“文献”词义的范围，只认定“文字记载”才是“文献”，非文字记载的知识载体就不是“文献”。按这一定义，“文物”就不属于文献。因此，人们一提起“文献”，就总是与图书、典籍并列起来，有的统称之为“图书文献”、“典籍文献”。当然“图书”、“典籍”是文献，但不能等同于文献，即不能包涵全部文献。

三、现代文献概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算

起，中国历史文献已有 3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今天种类繁多的文献，与甲骨文、金文相较，真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古代的“文献”概念，当然不能适用于发展了的今天。要建立科学的现代文献学，首先必须对“文献”一词作出新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含义，说法不一。《文献》杂志 1985 年第 4 期，开辟了讨论专栏，展开了讨论。该刊编辑部在《致读者》一文中指出，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解释，代表性的意见为两种：“一种是把‘文献’看做是一联合结构的名词性词组，文指文章，献指贤人，另一种认为文献是指图籍和文物。”该刊同期发表邵胜定《说文献》一文，对两种解说都不赞同，他认为文献即上献的书籍文章，不应包括文物。《文献》1986 年第 1 期刊载傅振伦的《释文献》与单柳溪的《文献诠释》两文，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傅文说：“文献学就是图书资料之学，包括口碑，往事的追记回忆，不见经传的古迹古物的再现、勘查，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民俗调查等资料在内。换言之，文献学也就是目录学。”单文则认为：“具有使用价值、历史价值的字、词、语、篇、书、人、时、事、地、物具体材料的科学、典型、完备知识的资料，就是文献。”学术界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兹不具引。

如何定义“文献”的词义，关键是它能否包容发展了的物质技术及其用途。今天讨论“文献”一词，不是考证词源的语义界定，而是作为文献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反映现代化的“文献”实际，要有科学性，因此本书对“文献”的涵盖，定义如下：

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均为文献。

在这个定义中，一切图书、期刊、报纸、图画、谱表、有历史价值的符号、文物，以及各种视听资料，如胶片、胶卷、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影片、磁带、电脑光盘、网络资料、数字资料等，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只不过是形式与载体不同而